

學術對談

數字時代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發展與挑戰

主持人：陳韜文、黃煜

對談人：林富美、周樹華、胡智鋒、韋路、郝曉鳴、唐緒軍、
張濤甫、馮建三、楊意菁、劉海龍、羅文輝、蘇鑰機

統稿：陳韜文、程曉萱



第一排 (由左至右)：陳韜文、黃煜

第二排 (由左至右)：林富美、周樹華、胡智鋒、韋路、郝曉鳴、唐緒軍

第三排 (由左至右)：張濤甫、馮建三、楊意菁、劉海龍、羅文輝、蘇鑰機

陳韜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與榮休教授、《傳播與社會學刊》
創刊主編。研究興趣：政治傳播、新聞學研究、國際傳播。電郵：jchan003@gmail.com

程曉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傳播與社會學刊》執行編輯。
研究興趣：媒介社會學、新聞生產。電郵：daisycheng@cuhk.edu.hk

Dialogue

Chinese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n the Digital Ag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Moderators: Joseph M. CHAN, Yu HUANG

Discussants: Fu-Mei LIN, Shuhua ZHOU, Zhifeng HU, Lu WEI,
Xiaoming HAO, Xujun TANG, Taofu ZHANG, Chien-San FENG,
Yie-Jing YANG, Hailong LIU, Ven-Hwei LO, Clement Y. K. SO

Editors: Joseph M. CHAN, Daisy Xiaoxuan CHENG

Abstract

This is a roundtable attended by editors of the major communication journals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societies of 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The first set of topics pertains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journals, including their positioning, review system, status of submissions, criteria for acceptance, setup of special issues, and the impact of citation statistics on the journals. Most journals have already adopted the double-blind review method. The journals differ in how they combin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pursuits and whether they follow their governments' policy concerns. The inclusion of journals in citation databanks is the trend to come. It serves to enhance a journal's competitiveness as a venue for quality articles. The second set of topics relates to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journals, the trend of studies, and the changing roles of journals in the digital age. One common problem facing the journals is the difficulty in the solicitation of reviewers.

Joseph M. CHAN (Research Professor and Emeritus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unding Editor-in-Chief of *Communication & Society*.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stud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aisy Xiaoxuan CHENG (Ph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ecutive Editor of *Communication & Socie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sociology, news production.

Chinese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n the Digital Age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digital media studies have become an overwhelming subject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Many editors agree that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such studies remain to be articulated. They are also concerned about how the journals can ride on the digital tide to improve themselves in terms of openness, timeliness and accessibility.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Chan, J. M., & Cheng, D. X. (Eds.). (2017). Chinese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n the digital ag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1, 1–40.

圓桌對談參與者簡介

(按姓氏筆劃排序)

- 林富美，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教授、《傳播研究與實踐》資深編委
周樹華，美國阿拉巴馬大學傳播與信息學院教授、《傳播與社會研究》編輯委員
胡智鋒，中國傳媒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現代傳播》主編
韋路，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執行編輯
郝曉鳴，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教授、*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主編
唐緒軍，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教授、《新聞與傳播研究》主編
張濤甫，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新聞大學》主編
陳韜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教授、《傳播與社會學刊》創刊主編
馮建三，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時任《新聞學研究》主編
黃煜，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教授、《傳播與社會學刊》發行人
楊意菁，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教授、時任《中華傳播學刊》主編
劉海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國際新聞界》主編
羅文輝，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傳播與社會學刊》主編
蘇鑰機，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副主編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導言

黃煜：為了慶祝《傳播與社會學刊》創刊十週年，我們很高興邀請大中華地區11本主要中英文傳播學刊的負責人共聚香江，參加「華人傳播研究與學術期刊」國際學術會議。在此，我們邀請各位學刊的主編與資深編輯介紹自己的學刊定位、投稿量與接受率、選稿標準與審稿考量、專題的安排、不同地區期刊的作者情況並分享目前期刊面臨的主要問題。此外，我們也邀請大家探討：華文傳播期刊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麼？TSSCI、CSSCI和SSCI等數據庫對傳播學期刊有何影響？目前傳播研究有哪些新趨勢？學刊在推動或改變這些趨勢時有哪些做法？最後，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在數字媒體時代，知識生產與學術傳播日益網絡化，學刊的形式與出版的正當性是否正在轉變？請大家暢所欲言。

陳韜文：十年前我們創辦了《傳播與社會學刊》。當時學刊創辦的宗旨，是為了促進華語傳播學者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十年來，這一社群不斷擴大，水準也在共同提升，作為學刊的創辦者我們深感欣慰。接著我們展開圓桌討論，首先請大家簡介一下各學刊的發展和運作狀況，然後再討論研究趨勢和學刊未來的角色等較宏觀的問題。

學刊的定位

羅文輝：《傳播與社會學刊》由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浸會大學於2007年創辦，創刊宗旨有三點：第一，鼓勵原創性的傳播理論探索並發表原創及優秀的研究成果；第二，為中港台及海外華文傳播研究者提供知性探討的平台；第三，宣導跨學科傳播學研究，促進華語傳播學術主體的發展。學刊以刊登來自世界各地的傳播學研究論文為主，輔以著名學者學術對談、傳播論壇等欄目，讓讀者更深入掌握當今傳播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發展。《傳播與社會學刊》2013年成為「台灣社會科學引文

數字時代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發展與挑戰

索引核心期刊」(TSSCI)收錄期刊，2015年成為「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附屬學刊，是全球獲此殊榮的第一本非英文期刊。

唐緒軍：《新聞與傳播研究》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主辦，創刊於1994年，初為季刊，後改為雙月刊。多年來，該刊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CSSCI期刊、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文核心類期刊三大評價體系中均處於本學科專業學術期刊的領先位置。2013年，《新聞與傳播研究》入選「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我們藉此機會對之進行了全新改版，稱之為「洗心革面」。所謂「洗心」，指的是內容方面，明確了「透視新聞、解析傳播、專注研究」作為辦刊理念，確立了「代表中國新聞學、傳播學學術研究的最高水準，引領中國新聞學、傳播學研究的發展方向」作為辦刊追求，建立了雙向匿名評審制度以保證刊發文章的品質；所謂「革面」，指的是形式方面，不僅縮短了刊期，由雙月刊改為月刊，而且重新設計了開本、封面和內頁，採用了網上投稿和編輯系統。

劉海龍：《國際新聞界》可以追溯到1961年，當時叫《國際新聞界簡報》，更像是給中央、政府提供國外新聞界發展動態的刊物。本刊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刊載國內外新聞傳播學各領域理論和應用研究的原創成果。之前教育部做了一個A刊評估，把國際的期刊和國內的四個期刊放在一起，學者在國際期刊發表一篇文章和在國內這四個刊物上發一篇分量是一樣的，我覺得這個導向是正確的。但後來遇到兩個意見，一個是為什麼要把英文刊物放進來，一個是為什麼要把中文刊物放進來，現在教育部不再推動了。這其實帶來一個問題，就是華文期刊定位是什麼？我們是不是要辦成英文期刊的中文版？在英文期刊發表的文章是不是翻譯成中文就可以在我們這裡發表？我們的獨特性在哪裡？我覺得是不是除了方法、規範以外，還有表達方式，我們能推動一種什麼樣的表達。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胡智鋒：《現代傳播》創辦於1979年，正式出版於1983年，迄今已有37年歷史。它的歷史發展可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至1990年，以服務學校教學為主，主要刊登北京廣播學院老師的教學成果。這個階段刊物過於內部化而顯得層次不高、影響力有限。第二階段是1990至1997年，以面向社會文化為訴求，大膽地將學校內部的教學成果刪減，而以展示社會文化的研究成果為主要內容，力圖使刊物成為有重要影響的思想文化期刊。但這一階段由於辦刊風格過於外部化，學術邊界模糊，與主辦單位北京廣播學院的關聯度削弱，也遭致了各個方面的壓力。第三階段是1998年至今，這一階段以傳媒學術為主要訴求。在綜合對照中，我們確定了傳媒學刊的辦刊理念以及獨特定位：與一般大學的人文社科期刊相比，我們打「傳媒牌」；與傳媒業界機構創辦的業務類、實踐類期刊相比，我們打「學術牌」。這就是我們的獨特定位。傳媒學術的理念與定位，使得《現代傳播》獲得了穩健的發展狀態，擁有了它特殊的影響力與號召力。我們將傳媒的實踐品格和學術理論品格相結合，始終以對話的姿態來架起傳媒業界和學界溝通交流的平台和管道。

張濤甫：《新聞大學》由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主辦，作為一家在新聞傳播領域較有影響力的專業學術期刊，有志於增進新聞傳播專業知識理論創新。《新聞大學》於1981年創刊，辦刊宗旨為：以新聞傳播學學術研究為主，結合新聞傳播的實踐，提高我國的新聞事業理論和總結新聞傳播經驗。本刊面向全國新聞傳播學界、新聞媒體、新聞從業人員以及新聞愛好者。主要欄目包括：新聞理論、新聞史、傳播學、新聞業務、廣播電視、媒介經營管理、媒介與文化研究。

馮建三：《新聞學研究》於1967年創刊，當時台灣新聞傳播教育才剛萌芽，相關系所未及十所，而政大新聞系以其長久歷史創辦學術刊物以帶動新聞傳播研究風氣實責無旁貸。《新聞學研究》早期由「新聞研究所」獨立支撐，外援不多。1999年起，本刊

數字時代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發展與挑戰

改為季刊形式。此後投稿論文篇數逐年遞增，因而成為華人地區出版持續最為穩健之新聞傳播學術季刊之一。2007年起本刊成為全球華人傳播學術社區首本全文上網之期刊，自1967年春季創刊之第一篇論文至最新發表成品均可從世界各地自行瀏覽與下載，反映了本刊信奉「開放近用」(open access)之理想。本刊收錄於TSSCI、CIOS、DOAJ及ELSEVIER等期刊資料庫。2013年起，本刊的投稿與審稿過程均可在線上完成。

楊意菁：中華傳播學會為台灣最具代表性之傳播學會，於2002年創辦《中華傳播學刊》，每年出版兩期，並於2005年起，獲「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SSCI)收錄。本刊特色為：一，為華人傳播研究社群提供對話的論壇；二，鼓勵具開創性、前瞻性、反思性的傳播研究；三，發揚傳播知識的生活意義與社會貢獻；四，促進傳播學與其他學門的對話。

林富美：《傳播研究與實踐》於2011年1月創刊發行。2014年初，創刊三年後，首次申請科技部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之「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資料庫(TSSCI)，於2014年10月正式成為TSSCI所收錄之核心期刊。2016年3月，榮獲國家圖書館所頒贈之「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獎傳播類」第三名。本刊特色是扣緊台灣社會所關注之議題規劃專題，公開徵稿，期待與新聞傳播產業及社會有更緊密之互動。

郝曉鳴：《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亞洲傳播學報》)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及與亞洲媒體與信息中心共同主辦，創刊於1990年，是一本國際化的匿名評審期刊。本刊希望為聚焦於亞洲或帶有亞洲視角的高品質研究提供發表的平台。我們希望將亞太地區和亞洲學術群體的傳播學研究介紹給更大範圍的國際學者。

蘇鑰機：《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CJC)於2008年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創辦，並由美國學術出版社Routledge負責印刷及發行。這本年輕的學術期刊於創刊後三年，便被納入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SSCI，可說是快得令人有點意外。當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時在國際上很少以英文出版而專門針對大中華的傳播學術的期刊，而國際學術界對中國的興趣愈來愈濃厚，華人傳播學者的人數和能量也逐漸上升，因而令CJC這本期刊的學術角色受到重視，正好填補了一個剛冒出來的空隙。CJC的定位是面向大中華及海外的傳播學者，希望能夠成為一個學術平台，並充分發揮香港的仲介角色，讓來自四方八面的英文學術稿件得以匯聚，共同促進大中華傳播學研究的發展。

章路：*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CAP) 創刊於2016年春季，是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的官方學術季刊，由SAGE出版，向全球發行，是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學科第一本真正同行評議的英文學術期刊。CAP的刊名清晰點出了該刊關注的焦點：傳播與公眾之間的互構關係。首先，該刊主要考慮與公共傳播有關的研究，也即在公共空間發生的、與公眾有關的傳播現象。其次，該刊旨在進一步凸顯當前有關「公共」(public)和「公眾」(the public)概念各種用法的學術爭論。第三，作為根植大陸、面向全球的一本國際期刊，CAP始終關注傳播現象的全球背景，致力於探索全球化進程對公共和公眾概念的重構，尤其重視在當前全球系統中處於邊緣位置的國家和地區的研究，以及全球多元觀點的交鋒與融合。

投稿量及接受率

羅文輝：從2011年到2015年，我們每年收到的稿件大約在90到95篇左右，稿件來源有限，所以我們非常珍惜每一篇稿件。《傳播與社會學刊》的接受率平均大概為24%、25%。我們每年會舉辦一個工作坊出一期專刊，如果把工作坊收到的所有摘要計算進去，《傳播與社會學刊》的接受率其實只有13%左右。

唐緒軍：《新聞與傳播研究》每月的來稿量約為120篇左右，每期的用稿量大約為10篇左右。除去約稿，自然投稿的接受率大約為4%-5%。

數字時代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發展與挑戰

- 劉海龍：《國際新聞界》不設任何門檻，故而投稿量比較大，每年總共會接收2,000多篇稿件，採用率大概在5%左右。這裡面有一些稿子明顯不符合我們期刊的要求，如果排除這些稿子，用稿率其實沒有這麼低。
- 胡智鋒：《現代傳播》兼跨業界和學界，刊物的稿件來源相當豐富，既有院校教師、學生，又有傳媒業界的從業者，每年的來稿量至少有5,000–6,000篇，每年的用稿量大約是300-400篇，用稿比率低於10%。
- 張濤甫：《新聞大學》期刊投稿量與接受量在8:1左右。
- 馮建三：《新聞學研究》從2004至2015的12年期間，假使進稿量以2008作為標準（使其為100），那麼，刊物從2004年以來，稿量是逐年增加，至2008年到最高峰，其後2011年還能維持這個水平，但2012年至今，呈現遞減的趨勢，至2014年退回2008年水平，2015年又要稍低些。進稿量下滑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是好事情，就是我們同型的刊物增加了，稿量分散了。另一個原因也是目前很多中文期刊遇到的困難，我猜測是很多學者轉寫英文。《新聞學研究》2006–2015年的退稿率在52.27%至91.66%不等。
- 楊意菁：《中華傳播學刊》投稿量相當穩定，雖自2014年《傳播研究與實踐》收錄於TSSCI後，本刊投稿量受到些微影響，整體論文退稿率仍然不低。近十年以來，每年退稿率最高為82.6%，最低60%。由此可知TSSCI期刊，對於投稿者來說的確具有吸引力。
- 林富美：《傳播研究與實踐》2011年創刊，2013年至2015年投稿量持續上升。2015年的退稿率為51%。
- 郝曉鳴：《亞洲傳播學報》(*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目前每年收到300多篇稿件，其中大約有5%的稿件是從事工程學研究的作者錯投給我們的，因此我們真正收到的稿件應該是一年近300篇，遠遠超過我們每年可刊登的數量(32–36篇)。在過去三年中(截止2016年8月24日)，我們對來自52個國家的897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篇稿件做出審稿決定，其中被接受的稿件為95篇，接受率為10.59%。

蘇鑰機：*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近幾年的投稿量不斷增加，到了2015年數目接近150篇。而文稿的接受率在近幾年頗為穩定，現時約為20%。

韋路：目前*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正式出版或錄用的原創研究論文16篇(邀請的評論文章除外)，投稿論文80篇，接受率為20%。

選稿原則及論文評審

羅文輝：選稿原則方面，《傳播與社會學刊》歡迎各種文章，新聞傳播各領域文章我們都有刊登，基本上沒有特別偏好。只要跟傳播有關係，我們都歡迎。大家認為主編專門做量化研究，是不是對量化文章有偏好？其實沒有。我們刊登的量化研究比例不到30%，質化研究比例較高，最多是訪談，其次是個案分析、文本分析。我們當然希望作者的投稿能夠質化量化結合、採用多種研究方法。論文評審方面，收到稿件後我和執行編輯會先看，如果這篇文章符合我們的規定，會把這篇文章送給一位責任編輯負責，請他看看這篇文章值不值得送外審。如果可以送審，責編就會請兩位匿名評審評閱稿件，收到評審意見後會要求作者修改、接受或退稿。當然通常會修改，有時要修改很多遍。最後修改完畢，責任編輯會把文章送給我，由我做最後決定是否要接受。一般來講，我會尊重責任編輯的看法。

唐緒軍：選稿原則上，我們首先必須政治正確，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其次，要有創新性，或在思想上有所建樹，或在方法上有所突破，或對老問題給出了新解釋，或對新現象提出了新觀點；第三，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尤其是對新聞傳播熱點問題的長時觀察、學理探究和深度思考；第四，注重讓學

術在爭鳴中前進；第五，認稿不認人。通常，編輯根據以上原則對自然來稿先行初選，但有時也會根據一些特定的情勢優先考慮某些特定的稿件。比如，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從2014年下半年起，我們就優先刊發與此主題相關的學術文章。在選稿中，我們不拘泥於名家，只要論文寫得夠水準，無名小卒的文章我們也刊發。2015年以來，我們先後刊發了多篇青年學子的文章。在論文評審方面，我們2013年起開始建立雙盲的匿名評審制度。經過兩年多的運作，2015年期刊匿名審稿專家庫由2013年的30人擴充為150人，幾乎囊括了新聞傳播學科全國最優秀的專家學者，也充實了一些國際知名的專家學者。從2015年起，全面實現雙盲匿名評審制度。

劉海龍：《國際新聞界》的選稿首先看是否有問題意識，能夠切中現實的和理論的重大問題。其次看是否具有理論上的貢獻，具有創新性。第三是寫作和論證是否遵守學術規範。編輯部會做初步篩選，是否值得刊登主要還是交給匿名審稿人和各級編輯把關。目前的論文評審主要有四個環節。一是匿名審稿人審稿。我們目前有100多名海內外的匿名評審專家參與這一環節，我們會根據稿件的題目分給在本領域有特長的審稿人評審。這個環節是雙盲的，彼此匿名，雙方在修改過程中的信息溝通都要通過編輯部中轉。第二個環節是欄目主持。通過匿名評審的稿件會按欄目分到不同的主持人那裡。主持人主要是由我院各個領域的專家擔任，有些欄目的主持人不止一人，這樣可以對匿名審稿人標準不一致做一些糾正。第三個環節是主編助理審稿。最後再由主編進行終審，對所有稿件做統一權衡。我們希望通過這些環節，在外審和編輯部的權力之間取得平衡。匿名審稿人體現的學術共同體的判斷，最後兩個環節則體現了我們編輯部的導向。經常有稿件已經通過前面所有評審和修改，但是因為達不到其他稿件的平均水準到這裡被退稿的。此外，我們每月會有一次編輯部會議，一些疑難稿件會在編輯部上討論。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胡智鋒：我們的評審踐行「三審制」，首先由責任編輯進行初步審核，然後由編輯部進行整體審核，最後由編前會進行最後審核。關於評審的標準，這裡有很多問題，比如寬和嚴的問題，我們也曾經考慮過徹底的雙盲，但是用了不到半年就發現出現稿荒。也有時間成本的問題，來來往往的信件太麻煩。我們對有爭議的問題採取雙盲，一般情況下相信編輯部的決定。編輯部的編輯都是教授級，本身在這個領域耕耘很多年，應該有判斷能力。在選稿原則方面，《現代傳播》有相當多傳媒業界的稿子，在中國還沒有一家期刊像我們一樣和業界保持比較密切的互動，如果我們跟業界互動斬掉了，那我們的特色也沒了，我們對真正的中國傳媒界改革創新的、新鮮的促動也會消失。傳媒業界熱切地擁抱我們，我們沒有必要拋棄他們。儘管他們跟學術有時隔得比較遠，但是他們新鮮的新聞實踐、傳媒實踐，對我們有非常大的啟發。因此，我們決定留下這個特色，儘管可能從純粹學術的角度講，會降低我們的學術水準。但如果太過考慮學術本身的純潔，我們將丟掉自己的特色，也會冷落了傳媒業界。《現代傳播》扮演的角色是在業界和學界之間搭一個橋樑。

張濤甫：《新聞大學》把握稿件的原則有兩點：新意、規範。判斷稿件的「新意」：一看選題有無新意，看稿件論及的問題是不是具有前沿性，是不是真問題；二是看稿件對問題的切入視角是否有新意。有的稿件所論及的問題雖不是新問題，但切入的角度有新意，我們也會關注；三是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是不是有新意；四是新的研究發現。所謂的「規範」原則，主要體現在：一是理論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的規範性。無論是質化研究，還是量化研究，都應有規範性的要求；二是學術表達的規範性；三是學術倫理的規範性。論文評審審稿要經歷三個環節：欄目編輯初審；匿名評審；主編終審。我們既注重學術期刊的通行規則，注重匿名審稿規範性，也注重發揮本刊的傳統規則，注重發揮欄目編輯的專業優勢。

數字時代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發展與挑戰

- 楊意菁：《中華傳播學刊》對於投稿文章，只要是合乎學刊宗旨與特色，皆歡迎投稿，並依據評審結果判定刊登與否，不優先考慮任何稿件或主題。一般而言，投稿文章只會先進行形式審查，諸如文章主題是否與傳播領域有關、文章字數、引用格式等，只要合乎形式審查後，即可進入論文審查階段。由於期刊使用線上投稿與線上審稿機制，方便編務管理以及系統性的資料整理，因此初審時程皆能掌握在三個月內完成。
- 林富美：原則上，只要符合《傳播研究與實踐》內容方向，不管是傳播研究或實踐的論文，我們都會請編輯委員會推薦送審名單，再由主編決定送審順序。主編也會視需要加入適當的審查人。審查制度方面，研究論文將送請2至3名學者專家進行匿名審查。本刊主編考量期刊定位和特色，對於通過匿名審查的來稿內容有建議修改權。研究論文審查(包括編輯委員會內部審查、評審審查、主編審查、作者修改)約花費3至6個月。當兩名匿名審查者意見不同時，將送交第三位匿名審查員評審，再由編輯委員會決議是否刊登。
- 郝曉鳴：《亞洲傳播學報》的選稿原則與其他學刊的選稿原則基本相同，首先要求的是創新。具體來說就是看一項研究在理論、視角、方法和成果方面是否有新意，在知識拓展和客觀事實展現方面是否有獨特貢獻。除了這些基本要求外，我們發表的文章一定要與亞洲有關，或者是探討某個亞洲獨特的問題，或者是以亞洲的視角去研究一個世界共同的問題。在選擇稿件方面我們會優先考慮那些在理論方面有所貢獻的研究成果。在保證稿件質量的前提下，我們也會特別關照一些傳播學研究不太涉及的國家和地區。論文的評審工作是採取雙盲審的方式進行的。每篇收到的論文由主編進行初步篩選，那些在選題、立論和研究方法上存在明顯缺陷的稿件會被直接退稿。主編初步核審後把稿件傳給責任編輯(由一位副主編擔任)，責任編輯如果認為稿件存在重大問題會建議主編直接退稿，否則責任編輯會將稿件送給適當的閱稿人評審。每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稿件會交給兩個以上的閱稿人審閱。閱稿人會根據稿件的質量提出退稿、小改、大改或接受的建議，責任編輯根據閱稿人的建議和自己對稿件的看法(特別是當閱稿人意見不一致時)提出自己的建議，由主編做出最後決定，並通知作者。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篇稿件在一審過程中被直接接受。一般一篇稿件一般都要通過二審和三審才會被接受，個別稿件還會經過四審五審。

蘇鑰機：*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選稿原則，首先是以學術素質為最高考慮，文章要言之有物及有真知灼見。當然學刊的定位是和中國、華人或大中華有關，所以文章內容也應如是。我們樂見不同國籍及來自不同地方的學者投稿，只要稿件和大中華地區的傳播議題或現象有關即可。我們秉承自由、開放和包容的學術傳統，不限於某些研究領域、理論取向或研究方法，特別歡迎比較性的研究，它可涉及大中華地區之間的比較，也可談及大中華地區與其他國家的比較。有關論文評審的過程，接到投稿後編輯將作初步審視，認為符合基本條件的話，就送出作匿名評審，由最少兩名對題目熟悉的學者進行審查。評審者的意見之後會送回作者供參考，結論可以是接納、修改後重新提交或不被接受。作者被邀請修改及重投之後，評審者再次審閱及給予意見。通常整個過程在半年內應可完成，我們希望能盡量將評審過程的時間縮短，讓作者更快知道結果。接受文稿之後，我們會先安排在網上刊出，隨後的印刷版應在一年內可以看到。

韋路：*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發表文章類型和選稿原則如下，研究論文：每期發表約5-6篇原創研究論文。論文可以採用任何研究方法，必須言之有物，言之有據。專題論壇：每期將圍繞某一具體專題徵集評論文章或研究論文，要求作者圍繞指定專題撰寫批評或回應文章。評論文章為客座主編邀請發表，研究論文為公開徵稿，匿名評審發表。翻譯論文：將不定期遴選中國大陸優秀中文期刊論文進行翻譯，以專題形式

數字時代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發展與挑戰

在CAP進行發表。書評：每期將發表書評文章，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作者投稿或編輯特邀的單本著作書評文章，一類是圍繞某一專題或領域對相關著作進行綜述的書評。CAP特別鼓勵非歐美著作的書評文章，尤其是大中華地區出版的中文著作。除了學術著作之外，CAP也發表與本刊宗旨相關的大眾讀物和行業出版物書評。在論文評審方面，CAP採取國際通行的匿名評審制度，每篇論文將由兩位專家進行評審，如果兩位專家意見相左，主編將尋求第三位專家的意見，最終決定由主編綜合決定。

專題安排

羅文輝：《傳播與社會學刊》的創意之一是每年舉辦一個工作坊來吸引優秀論文。工作坊每年1月或2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每年都有非常多學者投稿。每年3月我們會發出工作坊邀請函，請大家寫兩千字左右的長摘要投稿，由工作坊委員會審核這些摘要。過去十年，我們的專刊(工作坊)涵蓋華語電影、新媒體事件、危機傳播、電視劇文化、新聞與閱聽人、健康傳播、媒介倫理、傳播教育和數字科技對新聞的衝擊等不同主題。2009年，我們收到119篇，接受的摘要只有9篇。2014年、2015年，我們收到90篇、67篇摘要。摘要的接受率大概在13%至14%左右。這些摘要接受後，我們會要求作者提交完整的論文，在工作坊上發表。我們也邀請作者於1月或2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停留一個月修改論文，並把修改的論文投給《傳播與社會學刊》的專刊。每年有10篇左右的文章在工作坊報告，這些論文送匿名外審後大概會有5篇被接受，刊登於專刊上。

唐緒軍：《新聞與傳播研究》的專題組稿通常有以下三種形式：其一是通過工作坊組織稿件。比如，2015年第7、8期我們刊發了由復旦大學「可溝通城市指標體系建構」系列研究成果共6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其二是通過研討會選擇優秀稿件。比如，2014年9月22日至23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瑞典隆德大學在北京共同承辦了「第五屆中國—北歐婦女與性別國際研討會」，本刊特別組織了一期增刊，刊發國內外學者文章12篇。其三是根據研究工作需要開設的專題。2013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受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的委託，著手編制《新聞學與傳播學名詞》。我們於2014年第7期起開設了「《新聞學與傳播學名詞》審定過程文存」專欄，每期刊登2至3篇文章。迄今，這個專題還在進行中。

劉海龍：《國際新聞界》的專題來源比較多。一是雜誌編輯部集體出題目，公開徵集。二是約稿，或通過工作坊、會議獲得一組主題相近的稿子。三是根據需要直接委託在某個問題上具有一定影響的學者來組稿，這些學者有人大新聞學院的，也有其他學校的。四是在我們的投稿系統中發現有類似性的稿子碰巧可以組成一個專題。過去我們每一期都有固定的「本期話題」，已經形成傳統，最近我們把它變得更靈活，如果沒有合適專題也不必削足適履。

張濤甫：《新聞大學》從2016年改版後，同時加大了對專題的策劃、投入。專題一定要做到引領性，我們這個學科太不缺乏問題了，缺乏的是引領性，我們在往這個方向走。截至目前，我們組織了四期專題。這些專題圍繞數據新聞、華萊塢電影、國際傳播、電信與廣電規制等主題進行了前沿、深入的探討。但是，這些專題距離我們的預期還有不小距離。今後我們將強化專題的引領性、學術性，提升每一篇專題論文的品質。在策劃方面，強化與專題論文作者的深度溝通，強化專題論文之間的結構和邏輯關聯，形成集聚效應。

楊意菁：專題論文已成為期刊論文的主軸，是台灣TSSCI期刊的重點之一，也是本刊之重點。《中華傳播學刊》試圖就新興的傳播議題或現象積極開發專題論壇，期望能對本土理論的發展和應用提供學術交流的機會。至於期刊專題的安排，需要較長

數字時代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發展與挑戰

時間規劃，但由於學刊兩年更換主編，因此對於專題的規劃，除非前任主編事先規劃，否則第一年在時間上較為匆促。目前專題規劃方式，除由主編與編輯委員討論規劃之外，亦曾邀請學術社群較為資深的老師擔任客座主編籌組專題論文。這個做法，除了能夠擴展更多學術思維，豐富期刊論文來源，亦能解決期刊編務的繁忙。但如何找到熱心服務又兼具籌組專題與研究能力的教授，恐是另一個重要問題。

林富美：《傳播研究與實踐》的特色是強調研究與實踐並行，它的最大特點是研究或是價值關懷都與社會的脈動和社會情境扣連。怎麼去維持一個開放性？讓一般的論文能夠進到這個期刊，可是又捍衛我們的這個特色？我們主編能夠做的就是企劃專題，透過一些專題的企劃來維持這個刊物重要的特色。比如台灣在反媒體壟斷、太陽花運動、香港佔中的時候，都會企劃相關的專題，維持我們期刊的定位。我們在企劃專題時，也會有類似口述歷史的心態，透過訪問去把它寫成一個專題。當然學術的嚴謹度不是很強，但它能夠與時俱進，為在這個時間點上發生的事情做一些歷史性記錄。我們的專題大概會花一年以上在編委會討論，主編會就討論的一些結論再去請教編輯的顧問團，然後把這個主題確定及公開。公開是期望大家投稿，此外主編也會主動邀稿，目前的退稿率維持在45%到50%之間。

郝曉鳴：*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一般會在每年發行的六期中安排一到兩期專刊。專刊可以是我們主動邀請相關的學者組織的，也可以是應相關學者的要求設立的。專刊的確立要由受邀或主動請纓的學者先提出一個專刊的建議書，由編委會（主編、副主編和書評主編組成）批准。在選題方面主要考量選題的重要性與可行性（有足夠的稿件）以及專刊主編的資質。所有專刊稿件也要經過匿名評審，主編會根據專刊主編的資質和經驗決定自己參與審閱的程度，可以把審閱過程完全交給專刊主編負責，也可以自己主持一審的工作。不管主編參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審閱的程度如何，他對所有接受稿件都有最後決定權。

蘇鑰機：*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每年10月面向全球傳播學者徵集專題計劃，學者可在次年1月以前提交專題計劃。編委會收到計劃後會進行評選，以決定專輯主題。專輯編輯與編委會擬定徵稿啟事，面向全球學者徵稿，收到稿件後按照匿名評審程序進行評審，以確保文章的質素和公平性。過去幾年間，我們出版過的專輯題目包括：創意工業的國際化、集體主義和中國傳播、中國社區中冒起的傳媒和挑戰、中國論述面面觀、中國媒體和全球化、媒體與國家關係、作為比拚場域的新聞獎、健康傳播、中國農村的互聯網發展、媒體和雨傘運動、在非洲的中國之聲等。

韋路：*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每年舉行一次傳播與公共性國際學術研討會，遴選優秀論文作為專輯出版。2015年首屆會議在浙江大學召開，主題為「社交媒體與公共參與」。2016年年會在賓大沃頓中國中心召開，主題為「身體、生活空間與移動媒介」。從2017年開始，CAP計劃將這一會議以ICA Pre-conference的形式召開，以吸引更多國際學者參與，提升論文品質和刊物影響。此外，CAP還積極邀請客座主編進行專題組稿，第2期已發表悉尼科技大學 Wanning Sun 教授客座主編的專題：Gender, Sexuality and Transgressive Publics。第3期將推出威斯康辛大學 Lewis Friedland 教授客座主編的博士生專輯：Trending。第4期將推出賓大傳播學院 Jessa Lingel 教授客座主編的專輯：The Other Internet。目前還有兩期專題在公開徵稿。第4期還將發表潘忠黨教授在《新聞與傳播研究》組織發表的「青年的數字生活與都市文化」專題論文的英譯，希望較為系統地將優秀中文傳播研究成果推向全球。

作者地域分佈

羅文輝：《傳播與社會學刊》的作者主要來自大陸、香港和台灣，最多

數字時代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發展與挑戰

的是來自台灣，約佔30%，香港約佔27%，內地約佔26%，美國以及其他地區約佔8%。我們希望作者分佈的地區能夠更廣。我們投稿的稿源最多的來自大陸。作者的性別比例相當平衡。

唐緒軍：《新聞與傳播研究》對作者的地域沒有限制，但對作者的單位有所限制。我們規定，除了專題，同一單位的作者同一期只能有一篇文章。總體來看，上海、北京兩地的作者刊文較多。

劉海龍：《國際新聞界》的作者主要還是來自內地，最近幾年也開始刊登英文稿件。海外來的投稿開始增多。經過上一任陳力丹主編的努力，我們期刊的自稿率降到了20%以下（這個數字看似高，但是從人大新聞學院教師和博士生的學術生產能力來看，這個數字已經相當低，結果導致大量好稿「流失」到其他期刊），讓《國際新聞界》成為一個真正公平的「學術公器」。我們對2015年《國際新聞界》刊登的100多篇論文的通訊作者做了一個統計。數據顯示有93%的通訊作者來自內地，3.1%來自港台，3.9%來自海外。非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通訊作者佔81.3%。通訊作者的職稱分佈是：教授27.3%，副教授28.1%，講師和助教21.1%，博士生15.6%，碩士生0.8%，其他（主要是新聞傳播業務單位）7.1%。通訊作者中985、211高校佔56.3%，其他高校佔35.9%，海外高校佔7%，研究機構佔0.8%。

胡智鋒：《現代傳播》的作者主要來自於中國大陸，而中國香港和台灣地區的作者佔比相對較低。相當大一部分作者來自傳媒業界。

張濤甫：《新聞大學》的作者主要來自內地高校，也有部分來自業界的。此外，也有少數海外作者，包括英、美、加以及港、台作者。今年改版後，我們增設了海外編委，意在加強《新聞大學》的國際化，吸引更多的海外作者來稿，主要是海外華人作者的來稿。從內地作者分佈情況來看，《新聞大學》的內地作者分佈幾乎遍及東、中、西部地區，作者多為高校教師，也有部分新聞傳播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和媒體從業者。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馮建三：假設台灣在傳播領域的學術工作者超過四百位，如果其中七成以上的人擁有博士學位並且一人一年撰述一篇中文論述，那麼每年按理會有兩、三百篇論文投遞至各個期刊。由於《新聞學研究》創刊最久，且從1999年由半年刊轉為季刊，加諸2000年起台灣的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委員會(2014年改制為科技部)推動建制的資料庫收錄本刊，可能增加作者投稿本刊的意願，其稿量在相當時間內也就應該穩定增加。但從數據上來看，事實僅有部份符合這個預期，最近幾年來出現的是逆反趨勢。另一個現象是，具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職稱且工作地點是台灣的作者，僅佔《新聞學研究》總稿量50%左右，亦即一年投稿至《新聞學研究》而在台灣任職且具有博士學位的人數僅在四十多至六十多人。

楊意菁：《中華傳播學刊》作者來源則以台灣地區作者為主，佔95.1%，只有少數投稿者來自香港與大陸，未來也歡迎兩岸四地的華人學者投稿。投稿論文的作者職別，以副教授職別為最多，佔29%；其次是教授，比例為25.7%，助理教授則為23.7%，另有15.9%為碩博士生，由此可知，碩博士論文只要撰寫品質良好，一樣可以刊登於TSSCI期刊。

林富美：《傳播研究與實踐》2013-2015年收到105篇稿件，其中只有5篇是非台灣學術機構作者的投稿。另翁秀琪主編會向海外專家(如李金銓、Alain Brossat、Douglas Kellner等)主動邀稿。

郝曉鳴：投稿《亞洲傳播學報》最多的五個國家和地區分別為美國(185)、中國大陸(94)、印度(94)、韓國(91)、香港(55)。來自這五個國家和地區的稿件的接受率分別為香港(20%)、美國(19.46%)、韓國(13.19%)、中國(8.51%)、印度(1.05%)。來自美國、香港、韓國和中國的作者大部分是具有博士學位的學者或在讀博士生，而來自印度的作者大多沒有博士學位。

蘇鑰機：從創刊至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刊登論文的第一作者中，約35%來自美國、來自香港、台灣、中國大陸的作者各佔約15%，此外還有作者來自澳大利亞、英國及新加

坡等地。近年CJC的中國大陸投稿者比例上升了，來自美國的則稍為下降。

韋 路：目前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出版的3期文章中，總共包括來自11個國家的65位作者，其中美國作者43位，佔三分之二左右，主導地位較為明顯。中國以9位作者（包括2位香港作者）名列第二，佔總數的13.8%。以色列3位，澳大利亞和尼日利亞各2位，加拿大、新加坡、奧地利、瑞典、丹麥和韓國各1位。

學刊面臨的主要問題

唐緒軍：現在《新聞與傳播研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到底哪些論文屬於新聞學、傳播學範疇的，哪些不是？由於當今傳播學滲透進各個學科，而各相關學科的學者也在從事與傳播相關的研究，其結果是投稿本刊的一些論文可以說是社會學研究、法學研究、女性主義研究或文化研究，僅僅只是跟新聞學和傳播學沾一點邊，對這樣的文章該怎麼處理？常常使我們左右為難。也有學者建議乾脆設一個跨學科欄目，把此類文章置於這一欄目下，以擴展新聞學傳播學的學科邊界。對此建議我們還在評估中。此外，匿名評審專家的使用也是個問題。我們聘請的匿名評審專家都是國內一流的學者，但這樣的學者往往都很忙，很難按時審回稿件。現在我們的做法是儘量使用一些在學術上嶄露頭角的中青年學者作為匿名評審專家。這樣做的好處是，中青年學者積極性比較高，能夠保證按時回審率，但是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稿件的通過率比較低，往往兩輪審下來，全聽審稿專家的，就無稿可用了。

黃 煜：今天討論中一個反覆呈現的問題就是：傳播學刊物經常收到一些好像有點關係、但很多時候又覺得沒什麼關係的稿件。那麼我們核心的知識在哪裡？這個問題在各個學科中都存在，不同學科的期刊都在討論這個問題。也許我們正在經歷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一個知識革命和疆域再造的過程，我自己很希望我們的學刊能夠做一個集體的努力，看看傳播學、新聞學或以媒介為中心的媒介學中，傳統的疆域在多大程度上被改造了。由於新的知識的湧入，傳播學的核心知識的內在的肌理和知識本身再造的過程其實改變得很厲害。從這個意義來說，其實各個學刊都在為創新和轉換這個範式做出努力。可能我們意識到了，可能我們還沒有意識到。我們可以和以前拉扎斯菲爾德那時候帶入傳播學的一批知識和現在帶入的知識做一些比較，可以發現傳播學的知識革命也在悄悄地開展，其實我們根本就搞不清楚它的疆域在哪裡，它的路程該怎麼走，這個才是比較困惑和實際上常常挑戰我們智理的。比如有時候我們看很年輕的學者寫來的文章，幾乎看不太懂，不知道是寫得不好，還是我們的知識已經完全被顛覆了。這個時候我們希望主編思想能夠解放再解放，開明再開明。我們讀到太多這樣的故事，很多被著名的學報不斷地拒絕，最後在一個邊緣的學刊生長成大樹，我希望這樣的故事能夠在我們這些學刊裡更多地流傳。

劉海龍：和隸屬報業集團的刊物或學校級別的學報相比，《國際新聞界》這種學院辦的期刊缺乏正式人員編制，大部分人員都是兼職當差。他們有沉重的教學科研壓力，無法投入太多。這種小作坊式的辦刊方式困難不少。一是管理體制比較落後，人財物的自主性都比較小。除了編輯期刊內容外，很難開展其他活動，不適應媒體融合的現實發展，也不能與時俱進地為學術共同體提供更好的服務。二是整體上看，目前中國新聞傳播研究平均水準還不高，好稿還是太少。有一些課題稿件，從立項時就缺乏學理，完全是配合政治需求，到發表時壓力大，粗製濫造。不少稿子其實我們是不太滿意的，因為版面填不滿，只能矮個裡拔高個。三是匿名評審制和審稿環節多導致審稿週期比較長。因為稿件多，審稿人有限，且基本是義務勞動，有些稿子的審稿週期就會比較長，導致投稿

數字時代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發展與挑戰

人和審稿人都有一定不滿和抵觸。四是前幾年大家一股風地改了月刊，導致發稿量增加，編輯週期縮短，節奏過快，捉襟見肘。

胡智鋒：目前《現代傳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高創造力、水準拔尖的力作相對欠缺，這與中國大陸的傳播領域學者正處於年齡交替之時有關。

張濤甫：《新聞大學》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稿子品質。沒有品質保證，期刊難以辦好。我們期刊的稿源充沛，但好稿不甚多。為此，我們要拓展稿源。我們將發揮欄目編輯的專業優勢，發掘他們的學脈資源，吸納更多的優秀作者把他們優質的稿子投給我們。另外，要需要加大策劃的力度，編輯端口前移，做好提前量，圍繞一些前沿論題，提前定制優質稿件。

楊意菁：《中華傳播學刊》運作多年，雖處於穩健運作狀態，但仍不免面臨以下幾點挑戰：第一，如何擴增稿源。目前競爭期刊增加，再加上升等條件放寬，未來投稿必要性減低，這些對我們增加稿源是一個挑戰。第二，邀請評審委員。評審委員難以尋找，究竟是學術服務還是免費勞工？此外，評審意見極化的問題也存在。第三，TSSCI評鑑制度，對台灣傳播期刊也有不小影響。評鑑制度的合理性需要探討，一旦制度改變可能又會帶來挑戰。第四，編務人員的穩定性，學校辦刊和學會辦刊的期刊，在編務人員的穩定性上有所不同。第五，紙本期刊與電子期刊的問題。這也涉及到下載權限與商業化學術出版、剽竊、保存等等問題。

林富美：《傳播研究與實踐》最主要的問題是邀請審查委員，目前學術社群，研究、教學與服務的責任越來越重，如何找到專長適切，能於忙碌中情義相挺的審稿人，著實不易。本刊會請編委多提一些評審人選，以應付審稿期程壓力下，能如期、如質地完成審稿機制與品質管理。

郝曉鳴：《亞洲傳播學報》的主要問題是缺少高水平的稿件。我們收到的稿件數量很多，但高水平的稿件還是很少。雖然最近幾年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來自在亞洲工作的學者和學生的稿件增加了很多，但這些稿件在選題、研究方法和規範化方面都還有一定差距。我們刊發的稿件主要來自青年學者和博士生，資深的學者們還是傾向於把稿件投向那些影響力更大的刊物。與此相關的是我們在SSCI刊物中的排名，作為一個區域性綜合性學報，《亞洲傳播學報》的讀者群是有局限性的，而在這些讀者中能夠在SSCI期刊上發表文章的人數也是有限的。因此，我們所發表的文章不可能會被很多在其他SSCI期刊所發表的文章引用。雖然我們意識到這種局限性使《亞洲傳播學報》不可能成為一份引用率極高的學報，但在SSCI傳播期刊的排名上我們仍然希望我們期刊的影響因子會有所增長。稿件數量大自然需要更多閱稿人，在這方面我們也面對一定的困難。

蘇鑰機：*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投稿的水準頗為參差不齊。投稿的數量不缺，但一些學者所寫的文章以描述性的內容為主，缺乏理論框架和意義，沒有就相關領域提供新的知識或獨到見解。另一個問題是，現在邀請評審學者有相當困難，頗多被邀的學者都婉拒，相信是他們都很忙碌，未能花時間作評審。有些答應審稿，但在到限期時仍未完成工作，於是要再多花時間等候，結果是評審過程比預期長。

韋路：作為一本新刊物，*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知名度較低，導致投稿數量、特別是品質較低，稿源壓力較大。目前主要靠邀請稿件和客座主編專題為主。另外，尋找論文評審專家也存在困難，往往一篇稿子要發多個邀請才能確定兩位審稿人。書評組稿也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華文傳播學刊面對的挑戰

唐緒軍：我認為學科邊界的不清晰和研究範式的蕪雜可能是當前華文傳播學刊面對的主要問題。但各個期刊的情況不一樣，面對

數字時代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發展與挑戰

的挑戰也各不相同。我覺得，對我們期刊來說，缺乏原創性的理論文章可能是最大的挑戰。

劉海龍：總的來看，我比較樂觀。我認為華文傳播學刊的論文品質在不斷提升，尤其是內地的刊物近年來進步很大。相信隨著新生代的崛起和大量有海外學習經歷的作者加入，內地傳播期刊與國際期刊的差距會越來越小。

我覺得最大的挑戰是能否形成自己獨特的視角與風格。期刊能否關注中國的問題，或者說真正讓中國研究者 / 讀者有共鳴和感興趣的問題，而不是變成國際期刊的中文版。我們希望稿件能夠有更宏觀的理論或現實關懷，而不是僅僅討論局部的技術問題。當然，這不是說符合學術規範的小問題的討論我們不需要，而是說在討論這樣的問題時，應該帶有全局意識和現實關懷。另外就是學術風格的多樣化，尤其是表達方式的多樣化，而不是千篇一律八股文似的寫法，儘量增加可讀性和思想性。當然，改進語言的背後則是研究範式、理論的建設，很難一夕可成，但是我們希望能夠發掘和培養一批風格獨特的學者成為我們的作者。

另一個挑戰是我們這些研究(新)媒體的學者自己辦的刊物卻正是我們批評的那種「舊媒體」。如何跟隨我們原有的讀者遷移到新媒體平台，如何讓更多的學者和年輕的學生讀到我們的文章，並對之產生興趣，既不能丟掉學術水準，又要吸引讀者，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很大的挑戰。

胡智鋒：當前華文傳播學刊在如下三個方面面臨著共同問題。第一，傳播學術的困頓，帶來的傳播學術期刊所面臨的壓力。當下傳播學核心的規定性受人質疑：一方面我們看到社會發展使得如今各個領域都離不開傳播，傳播研究有了廣泛的適用性；但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在於當所有領域都在做傳播研究的時候，傳播學就缺乏獨立內在的學術、學科規定性。這使得在中國原本發展並不充分的傳播研究，出現了彌漫和泛化。相應的，這也成為傳播學術期刊面臨的問題。傳播學術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研究的廣泛適用性，給了傳播學術期刊廣泛涉獵多學科的機會；但同時我們又難以凝聚核心的學術邊界和規定性，缺乏獨特的內容領域。

第二，傳播教育的困頓，也帶來了傳播學術期刊的困惑。當下特別是在新聞教育領域，由於媒介發展的快速變化，使得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關係在發生著顛覆性的格局變化。顯然，新媒體特別是社交類媒體佔據了人類生活更大量的時間和空間，使得傳統媒體生存面臨著巨大壓力。這樣一個傳媒格局的變化，使得傳媒領域特別是傳播教育面臨挑戰。以傳統媒體為主形成的一整套學術話語面臨著困境狀況，而適應新的傳播教育的理念還需要時間來形成。同時，傳播教育與社會需求之間的巨大裂縫，也使得它舉步維艱。相對應的傳播學術期刊應該提供怎樣的資訊和思想，為什麼樣的學者和學生服務，這也是伴隨著傳播教育的困惑而產生的難題。

第三，「期刊」作為一個媒體樣態本身，面臨著紙質媒體的整體衰落，數字媒體的整體上升的局面。作為最傳統的媒體樣態，傳播學術期刊本身就是以紙質雜誌形態出現，與其他紙質媒體一樣，在當下數字化浪潮席捲下，越來越面臨著生存的巨大壓力。人們查找、閱讀、存儲文獻的方式，越來越依賴線上的、數字的、電子的內容。這就使得我們本來就費用高昂的紙版期刊印刷，陷入比較尷尬的狀態。是全面使用電子版而替代紙質版，還是採用其他方法，這是傳播學刊面臨的共性問題。

張濤甫：當前華文傳播學刊面臨多重擠壓：一是外部擠壓，主要是國際同類期刊的強勁擠壓。隨著新聞傳播學研究國際化水準的提高，越來越多的華人學者躋身國際學術期刊，甚至不乏躋身國際頂尖新聞傳播學學術期刊的作者。這固然提升了華人學者的國際影響力，同時也會稀釋華人傳播學刊的優質稿源。不少有國際學術發表能力的作者把好稿或主要精力投入

數字時代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發展與挑戰

到國際期刊上了，這就會攤薄了優質學術資源。二是內部擠壓，即華人傳播學刊內部之間的同質化競爭以及對稀缺資源的競爭。在一定時期內，好的作者、好的稿子數量有限，你多了，我就少了。因此，要整體提高華文傳播學刊的學術水準，短期內恐怕不行。我認為可行策略是，減少同質化競爭，提倡差異化競爭。

楊意菁：近年來，新傳播科技的發達，社群媒體的擴大使用，皆讓新媒體、新科技等相關主題成為各大期刊一般論文與專題論文的寵兒，但面對此一現象，是喜也是憂。喜的是，學術論文原本就該求新求變，最新的傳播熱門現象，絕對值得學術研究加以探索。但是追求新潮之外，傳播既有或是傳統的一些概念主題（或是傳播最根本的問題），以及長久以來應關注而未被關注的問題，也是值得探索的研究重點。因此，《中華傳播學刊》期許未來除了抓住時代脈動外，亦能回顧最紮實、最根本以及未被關注的傳播問題與概念，如傳播典範的再思辨、閱聽人概念的探源與流變、跨文化流動、或是議題設定理論等重要理論的變革與創新等等，而此也是本刊認為未來值得探索的重要主題。

郝曉鳴：《亞洲傳播學報》作為英文刊物，與華文傳播學刊所遇到的挑戰有所不同。在我看來，分散在兩岸三地的華文傳播學刊所遇到的最大挑戰是如何通過調和東西方在傳播學研究上的差異，確立華文傳播學研究的標準和方向。目前在台灣和香港出版的華文傳播學刊與海外傳播學刊在選題、研究方法和學術規範方面比較近似，但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傳播學刊有非常大的不同。大陸傳播學研究起步比較晚，同時受到整個社會科學研究文化所強調的實用性和政策性的影響，形成了一套有別於海外傳播學研究的體系和風格，在選題、研究方法和學術規範方面有很大不同。這些差異不能簡單地用好壞和高低區分，需要通過大陸和兩岸三地及海外學者更多交流來尋求相對統一和穩定的學術評估體系。但大陸學刊首先需要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向台灣、香港和海外學刊學習的地方是要建立完善的匿名評審制度，確保學術評估的公平。

蘇鑰機：*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作為一本英文期刊，有其特色也有其限制。它希望發揮溝通中西的橋樑作用，令外國學者也知道華人傳播研究的成果，甚至加入投稿行列。但英文期刊的對象只限於懂英文的讀者，因而未能包括一些不慣用英文的中國大陸學者。幸而不同學刊之間似乎有某種分工，能夠共同組成一個較完整並互補的學術出版平台。展望將來，會有更多年輕的中國學者懂得及使用英文，CJC的讀者和作者人數也會增加。當然每本期刊都要面對日益劇烈的競爭，大家都在爭取更多的優良稿件，相信這種良性競爭能促進華人傳播學術的發展。

CSSCI、TSSCI及SSCI對華文傳播學刊的影響

唐緒軍：對《新聞與傳播研究》的影響似乎不大。

劉海龍：從目前來看，SSCI對國內新聞傳播類期刊基本沒有什麼影響，因為雙方感興趣的題目和表達方式還是有一定差異。CSSCI對期刊的影響也比較間接，我們有自己的標準，目前來看，學術共同體也比較認可，所以對排名並不太在意。其實就算是沒有這個引文評價標準，期刊也還是會考慮讀者的閱讀情況。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關於新聞史的論文，有了引文系統，我們發現這樣的文章引用率很低。這給了我們啟示：它可以發在更專業的新聞史期刊上，我們期刊話題更綜合一些，讀者可能並不關注這種研究。從這一點上來看，CSSCI確實影響了我們，但是這種影響未必都是負面的。對內地傳播學刊影響更大的是各級課題。這些題目背後的思維方式比較單一，多是做政策註釋，或者是對策性研究，不少題目大而空，缺乏理論意義。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學者們趨之若鶩，自我規訓，導致了學刊來稿充斥著類似導向

數字時代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發展與挑戰

的研究，有時因為稿件不夠，還要勉為其難刊登，結果又造成一定導向上的誤解，我們也很無奈。同時這類課題結項壓力大，主持者還經常在正常審稿程式外做工作，造成不少問題。

馮建三：最近兩三年我幾乎每天都會接到電話說你有沒有論文要在SSCI發表？你需不需要幫你修改稿件？我懷疑是不是有很多人轉寫英文，不一定是期刊，可能是會議論文。我個人這種觀察好像也不無道理，我常常去不同的學校評審新的入職申請者，看到他們的著作，確實很多是英文的。我們創作的不自由就出現了。你的英文再怎麼好，總不會比母語好。我們也不歧視英文發表，但期待中英文有同等分量。我猜兩岸四地都有這個現象，行政權利單位都公然表示或暗示說你要寫英文。這個因素就是學術不自由的一個重要來源，你不能我手寫我口。我們如果能用英文寫當然很好，但不能這樣做也不是什麼大不逆的問題。扭轉這個情況對增加期刊稿件來源會有幫助。2004年的時候，我在一個研討會寫了全球化學術知識跟評鑒的問題，當時就有人主張，要學術創作自由應該要語言平等。英國人用英文寫作、德國人用德文寫作、美國人用英文寫作這是很自然的。可是好像只有在我們這裡，這種語言不平等的情況有很嚴重的表現。我們夠資深，可以不理會那一套，可是年輕人壓力很大。那是不是一定要這樣，是不是對創作有幫助、是不是對學術風氣有幫助，我是有懷疑的。

林富美：期刊進入TSSCI、SSCI或CSSCI資料庫以後，收稿較為容易，多少影響了未進入資料庫期刊的收稿狀況。且作者會將具品質論文優先投稿於上述資料庫之期刊，當然也影響本刊投稿之水平。

郝曉鳴：SSCI和CSSCI以及TSSCI是有本質不同的。CSSCI和TSSCI是由專家學者根據期刊質量的認識評審的，雖然這種評審有很大主觀成分，但評審是以選擇質量好的刊物為目標的。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SSCI期刊的選擇是由出版商決定的，不以期刊質量為首要標準，有很多好的傳播學期刊不在SSCI內。學者們在選擇學刊時通常會在期刊的聲望、自己的研究與期刊的側重點是否匹配等方面進行考慮。但當行政部門錯誤地把CSSCI、TSSCI和SSCI作為衡量研究成果質量的指標後，屬於這些數據庫的學刊自然會變成學者們爭相投稿的對象，這有助於這些刊物的收稿量和稿件質量的提高。對《亞洲傳播學報》而言，加入SSCI後我們收到的稿件在數量上有了很大提高，質量也相對地有些提高；負面的影響主要來自影響因子的排比，作者會在重點考慮我們刊物的影響因子的大小時而忽略我們刊物的針對性和對應的讀者群。

蘇鑰機：論文數據庫對學刊有很大影響。現時很多人投稿時，會先看看一些期刊是否有被某些數據庫納入。因為獲得數據庫的收錄，代表了學刊有相當的地位和聲譽，作者們較願意投稿給這些期刊。當然英文期刊都希望加入SSCI，中文期刊想進入CSSCI或TSSCI。除了加入數據庫外，還要看期刊的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這進一步界定了期刊的受歡迎程度。

展望將來的發展，希望這些知名的數據庫能夠適當地擴充，納入更多有質素的期刊，方便學者查閱參考。另一個可以商討的議題是，能否將類近的數據庫(例如CSSCI和TSSCI)聯合起來，作為一個規模更大和更完整的期刊數據庫？這樣，就可以更了解及比較一些學術期刊的特色和表現。一個較可行的做法是，將所有和華人傳播有關期刊每期的目錄及文章摘要，定時更新放在一個網頁上，方便大家查閱，以了解華人傳播研究的最新發展。該網頁可由某學院負責管理，所花的人力資源有限，而能造福整個華人傳播學界。當然也要各期刊配合，才能成就美事。

傳播研究的趨勢及學刊未來的角色

唐緒軍：隨著新媒體的廣泛應用，傳播研究確實面臨著許多新問題，醞釀著某些變化。我看到的趨勢是傳播研究的多學科融合。現在學界對新聞學、傳播學從學理到體例都在進行反思，這是我們學界的一個很大的問題，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因此，作為學界的學術期刊應該給這種反思或者批判提供更多的版面。說到學刊的引領作用，確實非常重要。2013年我上任以後，每年從我們雜誌發表的100多篇文章中選出10篇，作為我們刊物的優秀論文，給作者發證書發獎金，也是樹立一個標竿。我們這個學科歷史不長積澱不厚，怎麼樣樹立一個標竿，這是我們需要做的。另外，我們依據社科院的數據庫，每年從大陸公開發表的兩萬多篇文章中選十篇左右優秀論文，出一個集子，今年是第三年。這也是作為標竿，作為一個引領。我們這些都是華文的主流期刊，將來是不是可以一起做這件事，從台灣、香港和大陸發表的論文中每年評選一些優秀論文，作為我們這個學科華文傳播學研究的一個標竿呢？我覺得這樣形成一個機制，對推動整個學科的發展是很有幫助的。

胡智鋒：我想刊物的引領，首先是引領學術，第二可以引領學科，第三也可以引領一種文化。這個文化是期刊本身的包容度、開放度，包括評審機制到用稿的方式，這些都會營造一種做傳媒研究的一種文化。文化好，就可能發現、栽培、培育很多優秀的人才；文化狹窄、封閉，就會有遺珠之憾；更嚴重就會人才外流，我們就缺失了引領的機會、引領的功能，變成閉關自守的狀態。

張濤甫：傳播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也是以追求「經驗真理」為宗旨的。與其他社會學科類似的是，傳播學意在把握人類社會的新聞傳播現象背後的規律性，揭示經驗現實背後的邏輯性，但是，傳播學科無法依靠自身能力實現知識的自給，它需要其他社會學科通過理論或方法的援助。受助於外援，傳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播學實現知識的擴容。由於這些知識不是按照統一的話語語法生成的，造成知識生成邏輯的混雜，來自不同學科方位的知識之間難以實現話語邏輯上的自洽。傳播學知識「割據」現象甚為突出，究其原因，在於知識生產各自為陣，造成知識生產的支離破碎。在這種知識生產機制下出爐的傳播學知識，所揭示的「經驗真理」的「逼真度」會打折扣，其「硬度」不及其他社會學科，因而是一種「弱知識」。

當前的傳播研究的趨勢很難用清晰的軌跡或邏輯予以描述。一方面，傳播研究很活躍，興奮點很多，幾乎是遍地開花，這是新媒體技術釋放的雪崩效用所致。當前中國的傳播學話語生產甚為活躍，但這不足以說明該學科具有強勁的話語創新能力。恰恰相反，這是一種表面上的話語繁榮。生生不息、日新月異的傳播現實，全方位地刺激了傳播學者的學術好奇心和研究靈感，源源不斷刺激學者的學生產產。但是，傳播研究多是短線、即興的研究，「盲人摸象」式的研究甚多，呈現出的研究熱鬧是一種非均衡繁榮，諸多研究是粗放性、碎片化、淺表化的研究，缺乏與新媒體革命匹配的理論突破和範式革新，修修補補居多。很多研究成果「看上去很美」，形式上雖很規範，但多屬於「精緻的平庸」，缺乏有價值的學術內涵。華人傳播學刊需要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加強學術議程設置，引導傳播研究的深耕細作，爭取在傳播研究上有大的理論突破。

楊意菁：期刊除了是提供學術研究發表新知與觀點的園地外，是否也能扮演帶領學術研究風潮、社會脈動討論，甚至是影響傳播實務的角色？換言之，如果期刊能主動結合學術活動，或將期刊論文重要研究發現，以庶民大眾易懂之語言，透過大眾媒體傳播於社會大眾，或許更能發揮華人期刊對社會以及實務方面的影響。總之，華文傳播學刊有其存在價值與必要性，但學術期刊面對的困難與挑戰，也是學術社群必須共同面對之事。

林富美：新媒體研究、mediatization 研究、向實踐轉向等都是傳播研究的新趨勢。《傳播研究與實踐》在三個方向上均規劃有專題，例如近三年規劃了「言論多元化」、「新媒體研究之方法與概念重構」、「為台灣的新聞產業把脈」、「媒體與勞動的批判政治經濟學分析」、「高教專題」、「太陽花與佔中運動的媒介與實踐專題」等專題。此外本刊創刊以來即設有〈典籍再現〉專欄，或重新閱讀、詮釋經典文本，或以特定作者的相關系列著作，以長書評的形式，掌握經典的當代意義與啟發。2014年起，我們加入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為共同出版單位。舍我紀念館以新聞傳播史為研究重點，於期刊中不定期刊出專人撰寫之口述歷史專文，與該期專題論文相呼應外，也期待透過時間軸的敘事記錄，討論趨勢變遷與影響。

郝曉鳴：學刊的目的不是簡單地把文章匯集到一起，而是希望在當中選出最好的文章，代表這個領域的進步。我個人認為，傳播學研究總體而言在過去的二十年間沒有什麼重大突破，鮮有重大理論的提出。除了一些借用其他學科的理論來探討傳播學問題的文章外，傳播學研究給我們帶來的驚喜不多。傳播學刊在主動發掘新理論和新思想方面也非常欠缺。唯一讓傳播學研究得以紅火的是新傳播科技在改變現代人類的傳播方式和效果方面所帶來的影響。早期有關新傳播技術的研究基本上還是以原有的傳播學的思維方式進行的，但越來越多的研究正在幫我們認識新傳播科技對不同傳播領域所帶來的革命性變化，也包括對傳統傳播學理論的衝擊和再思考。大數據研究技術的發展為研究動態性的傳播提供了前景，傳播研究將不再是依靠回憶和虛擬的實驗來檢驗傳播動態和效果了。這應該是傳播學今後十年發展的重點。作為學術期刊，我們不應停留在紀錄傳播學發展的狀況，也應該通過對重點研究領域的關注，和帶有前瞻性的研究的扶持，為傳播學研究指出可能發展的方向。

周樹華：學刊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目的是去傳播知識 (disseminate information)。書籍出版篇幅很長、時間周期也很長，學刊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可以很快地傳播新知識。但是現在回頭去看，傳播這些知識並不需要期刊來進行了。比如通過網絡，假如一個學者不關心評職稱、拿 tenure，完全可以將新的信息放在網上讓別人看。為什麼現在期刊還有很大作用呢？我覺得它最大的特點就是質量的保證。一個學者在這個期刊發表了文章，就證明學術達到了一個水平。所以國外用盲審和很多制度來保證它的公平性，其實就是為了保證質量。我們當主編的對學術走向有非常大的影響。期刊發表什麼樣的文章？學術水平如何保證？這些問題的處理對學科的建設有很大的影響。

蘇鑰機：傳播研究近年的新趨勢，最明顯的是科技發展引領著研究方向。以前的研究重點由報紙轉為電視，再轉為互聯網，現時則看重新媒體及流動媒體。大數據的年代已經來臨，它是一種新興的方法，在傳播研究也有不少人參與。現時新媒體及社交媒體成為了很多研究的主題，帶來令人興奮的題目和方向。不過似乎研究的「硬件」有相當進步，但「軟件」卻未能跟上。有新的研究課題和資料，卻沒有相應的新理論或概念，未能在理論層次提升我們對新傳播現象的理解。我們發覺有一些較新的期刊出現，例如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和 *New Media & Society*，能迅速成為主要的期刊，其影響因子在2015年SSCI傳播期刊中位列首兩位。新媒體研究成為熱門研究對象，相關文章也在一些傳統的期刊如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中出現，甚至佔了頗高比例。

韋路：目前中國傳播研究大致呈現三大趨勢：第一，大數據。一方面，一部份學者狂熱鼓吹大數據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革命性，認為整個傳播研究都將被顛覆。另一方面，一些學者對大數據則冷眼相看，總體持保留和懷疑態度，甚至認為大數據就是大忽悠。雖然討論大數據的文章汗牛充棟，但真正的大數據研究則鳳毛麟角。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大數據的泡沫。

數字時代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發展與挑戰

第二，跨學科。雖然傳播學天生就是跨學科屬性較強的一門學科，但早期中國學者的研究主要以經典傳播理論的引介和驗證為主，視野較為狹窄。近年來，國內學者開始努力通過跨學科的傳播研究，推動理論創新和學科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從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管理學，甚至物理學、腦科學、電腦科學等學科中汲取營養，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研究成果。例如人民大學、浙江大學等在神經傳播學方面的探索，南京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在計算傳播學方面的開拓，雲南大學在傳播人類學領域的積累，都是很好的例子。

第三，全球化。隨著中國在國際舞台的和平崛起，中國傳播學研究的全球化取向也越來越凸顯。近年來，大量關涉全球化的傳播研究不斷湧現，包括全球資訊流動研究、全球傳播格局研究、全球公共領域研究、全球治理研究、中國軟實力研究、中國國家形象研究，以及針對全球議題的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研究等等。

數字媒體時代學刊形式與出版正當性

唐緒軍：學刊這種形式在目前中國大陸仍然具有正當性，在可見的未來一段時期也還會存在，關鍵是這個刊物對學界有沒有貢獻，學者願意不願意看。這兩年，本刊定價提高了50%，發行量不降反升也許就是個例證。

劉海龍：數字媒體時代確實給學術期刊帶來衝擊，學術信息來源更加多樣化，一家或幾家獨大的局面受到衝擊，有利於打破原有的體制和知識/權力的壟斷。我們認為網絡化的學術傳播是現有學術發表體制的一個重要補充，並不能完全替代共同體內部的大眾傳播。

原因如下：一是自媒體的發佈和網絡化傳播缺乏把關，換句話來說就是缺乏客觀統一標準的評審。對於一些短期內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受到追捧和轉發的研究，小部份內行可能心裡有數(礙於面子未必點破)，但圈外人無從判斷其研究的品質。學術刊物提供了這種權威性保證。二是期刊的平台對於一些新晉作者有提攜作用，平台本身可以給他們帶來關注度。如果他們自己發佈則效果未必理想。三是晉升、課題結項等成果需要權威平台的認證。四是我們這樣的期刊相對綜合，有利於增加偶然接觸，打破研究者之間的畫地為牢。

但是不可否認，如果新平台嚴格按照同行評議的標準，或者按照同人刊物的標準來做，加之機制靈活，很可能會後來居上，在影響力上甚至超越傳統的期刊。儘管現有國家政策和體制短期內不會有明顯轉變，對傳統學刊會起到「保護」作用，但是如果缺乏危機感，就像黨報一樣，影響力會逐漸被邊緣化。這種可能隨時存在。所以學刊要與時俱進，跟著讀者和學術共同體做平台遷移，同時更突出服務學術共同體的作用。除了發表研究論文和報告，開發新的形式，把學者們吸引到平台周圍。

馮建三：數字科技對知識生產與學術傳播的影響可以從「流通」和「生產」兩個方面來看。以下先對「流通」的成績略作陳述。目前，已有刊物採用台灣稱之為「創用CC」(Creative Commons)的作法，開放刊物所有內容自由任所有人，不分疆界，只要需要，就能在不改變內容、不作商業用途的前提下閱讀、存取與多次流通。僅以傳播領域為例，《新聞學研究》在2007年起就紙本與電子版同步發行，2009年以後並將所有期次全數以電子檔形式在網站上開放。近年同屬政大發行的《廣播與電視》及《廣告學研究》，以及2015年媒體改造學社創辦的《傳播、文化與政治》，也都採取這個模式；香港的《傳播與社會學刊》亦然。海外傳播領域方面，英語部分，今年剛好創立六十年的「國際傳播學會」(IAMCR)，在2013年創辦了《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半年刊。這些刊物如同中外文的傳統學術刊物，都會自行設置網站，或

數字時代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發展與挑戰

者同時進入資料庫且有電子檔流通。差別在於，有些傳統刊物會有紙本與電子檔的時間落差，而更關鍵的是，大多數傳統刊物必須另由個人或機構付費，才能使用，演變為學術創作無償，但流通書商可以從中獲利，有時反而致使學術機構的經費壓力大增。

華文傳播學術期刊在創用CC的採用，已領先英語刊物，更善用科技「傳播」而能彰顯本行屬性。較早採用創用CC模式的《傳播與社會學刊》與《新聞學研究》有兩個特徵：除了電子流通，它們同時發行紙本；並且，兩刊都是各自社會傳播領域的「市場」領導者之一。因此，兩刊多年來願意採納創用CC模式，除了有兩地學界特徵的配合，應該也是尤具意義，具有潛能以「傳播」領域的刊物作為示範，邁向學術知識最有效率的流通之路：最大程度的「免費」，因此也就是最大規模的「自由」流通。如果兩本刊物的出版機構合作，同時廣邀其他中文傳播學刊一起加入，就能聯合製作中文傳播期刊資料庫。那麼在商業資料庫之外，傳播領域等於是扮演領頭羊的角色，採用數字化技術，擴大本身研究成果得以自由流通的深廣範圍。若能有成，假以時日，將會得到廣泛的使用與喜愛，並在此過程真正落實學術知識自由「流通」目標。

「流通」與讀者的「使用」固然重要，但更有意義的可能是學術知識的「自由」「生產」。寫一篇學術論文不容易，寫了如果有80%、90%的機率被退的話，一方面刊登上很榮譽，但一方面你會覺得要寫嗎？若有出版的保證，多少可以減少或使這個心理狀態消失。因為我們現在有數字科技，可以對舊模式有所改進。過去我們的模式很簡單，就是不刊登，就是刊登，而刊登與否的理由，僅有作者與編輯（編委會）能夠知道。現在我們有數字科技了，要不要考慮根據評審意見按照（1）兩個通過、（2）一個通過 / 一個不通過、（3）退稿分門別類放在網路上，甚至將審查意見去掉評審者的名字一起登出來。新的作法分門別類，可能讓更多人不至於對投稿裹足不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前，如同「功不唐捐」則人人願意努力，如同市場有保證則生產會跟進。其次，減少「野有遺賢」的缺憾。第三，作者與審查人及刊物之間偶爾或經常可見的衝突，特別是作者認為刊物不公允的怨懟，可望因為公開而有較多的公評，因此或可減少。最後，審查意見(匿名或具名可以另作設計)完全公開，有可能對於學術知識的交流及學習，起到更好的作用。

傳統紙版刊物沒有採納這個模式，原因或許有三個。一是認知，不獲推薦仍然刊登，有損刊物的名聲，也可能讓作者因不願意龍蛇雜混而降低投稿的動機。其次，從讀者角度出發，這個模式等於是來稿審查後一定刊登，刊物的推薦功能減少，節約讀者時間的服務效能也降低。第三個原因可能也很重要，甚至更為關鍵成本。前兩個考量，無論是刊物的名聲、作者的投稿意願或讀者的閱讀效能，在分門別類的出版設計下，按理可以完全淡化這些情境至最低或歸零。然而，真要來稿完全刊登而只是名目不同，那麼，刊物所要耗費的編輯資源(從編輯行政的稿件收發登記、尋覓及安排審查人，《新聞學研究》一年必須商請協助的審查人數，雖不上千，必然數百)，不一定增加，但編印與發行成本勢必增加一倍以上，這顯然不是中文傳播期刊在資源不增的前提下，所能或所願意承擔。

現在，「數字媒體」時代降臨二十多年，傳統模式是在改變了。比如，訂閱紙本的圖書館與個人日漸減少，走向數位流通、紙本典藏分立的作法增加了；又如，特定刊物在紙版還沒有問世之前，先行電子檔並主動寄至訂閱電郵者，或用社交媒體對外週知等等。在這些變化之外，假使期刊採用數字媒體的特性，不以接納刊登/拒絕刊登的方式看待稿件，而是分門別類給予所有論文面對讀者的機會，同時由刊物的編委會依據審查人意見而給予不同程度的分類(推薦與不推薦)，並將作者與審查人的意見交流，予以部分或全部的公開以利學習，應該真正是善用數字科技的作法，從而真正讓社

數字時代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發展與挑戰

會(知識)制度與(傳播)科技的結合，完成更為和善的學術效應。在邏輯上，會有作者濫用這個模式，致使稿量增加而編輯難以處理，但邏輯的可能，不等於事實的存在。

如果中文傳播學術期刊聯合起來，走進這個方向，就是以新的實踐方式，不僅只是「彷彿」，而是提供了具體的事例，「站在舞台中央」、「成為社會聚焦所在」，親身向學界示範了學術知識的生產與流通之創新。

林富美：在數字媒體時代，知識生產與學術傳播日益網絡化，學刊的形式與出版正在轉變。如何讓知識生產與學術傳播受惠於網絡，更多元與擴散影響力，是一個發展趨勢。如何質量兼具、讓多元多形式的對話能呈現，當然考驗著期刊差異化類型的特色建構。

韋路：現在不少新創辦的刊物都以 open access 形式出版。這個方法優勢當然很明顯，文章閱讀面會比較廣，不需要買數據庫訂閱這個雜誌才能看到，有助於提高引用率。劣勢就是成本比較高，如果以 open access 形式發表，單篇論文大概是 800 美元的成本。現在基本上主流的、有影響力的刊物都不是 open access，所以擔心變成 open access 後，學者會覺得這個刊物檔次沒那麼高或都影響力沒那麼好，反而會有一些誤解。

郝曉鳴：《亞洲傳播學報》的出版和發行由商業出版社負責，電子版早已超過紙質版成為讀者閱讀學報所刊登文章的主要渠道。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紙質版會逐漸停止發行，讀者會通過更簡易和廉價的渠道閱讀我們的文章。與此同時，數字化也為傳播學研究的發表開拓了更為廣闊的路徑。越來越多以電子版為發行手段，免費開放的學報正在出現。如果這種趨勢繼續發展，傳播學期刊可能會達到飽和的階段，讓幾乎所有的傳播學研究都有發表的可能。到時，學報的聲望和所刊登文章的質量將成為學刊立足之本。

蘇鑰機：在數字媒體時代，學刊的出版形式也發生了變化，例如網上優先出版成為主流，文章首先要在網上發表，能搶時間先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1期(2017)

機，令文章更能吸引讀者的注意。將來相信會見到更多網上學術期刊，一些印刷的期刊也會加強網上的內容和管理，甚至轉型為純網上期刊。大家都朝著減低生產成本、方便讀者瀏覽的方向走，作為學刊的編輯要多花心思，工作量也會增加，方能與時並進。

本文引用格式

陳韜文、程曉萱(編)(2017)。〈數字時代華人傳播學術期刊的發展與挑戰〉。
《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1期，頁1-40。